

## 在中國成功本土化的經驗

蘇遠泰博士

### 1. 我們為何要參考佛教？

看見本文的題目後，基督徒可能會問為何基督教需要研究佛教在中國的經驗，好像基督教有甚麼不足的地方？如此更可能助長佛教的氣焰！從學術的角度看宗教研究，研究的範圍與研究者的信仰身份未必需要相同，即一個基督徒可以研究佛教，一個佛教徒同樣可以研究基督教；研究者只須遵守學術研究的規則便可。但我們亦承認，一個信徒研究自身的宗教，總會多了一份認同和委身的使命，尤其像基督教般有一信仰效忠的對象——耶穌基督——存在，能在研究的工作上有益於福音真道的建設和傳播，自然產生一種服侍上帝的感覺。

但歷史告訴我們，基督宗教在福音的傳播和教義的建立上，總是在有意無意間借用了其他宗教／文化的經驗，例如舊約聖經的以色列人從對迦南至高的神祇「El」的認識，把耶和華（YHWH）由以色列民族的戰神，發展為普世至高的上帝；<sup>1</sup> 初期教父借用希臘哲學（例如洛各斯〔Logos〕的思想）來講論基督的本質，並指出基督真理的啟示早存在於其他宗教文化內；<sup>2</sup> 奧古斯丁先受摩尼教的善惡二元觀念影響，後接受新柏拉圖主義的一元論思想啟迪，發展出深深影響西方教會的神學；<sup>3</sup> 宗教改革得力於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對希羅古典文化的探索等等。<sup>4</sup> 以上的例子反映出：在不同時代，許多基督徒嘗試以自己的文化資源，努力把基督的福音講明，回應不同的問難，以及把福音的奧秘解釋清楚。我們相信，中國數千年的深厚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同樣可能像其他文化一樣成為「神學之僕」

（*theologiae ancilla*），使基督信仰更具解釋的能力。<sup>5</sup> 基於此，讓我們真正地去認識中國文化，而不是以護教的態度去矮化中國文化；如此認識中國文化，對基督信仰亦可能大有幫助。

選擇以中國佛教作為本文討論的對象，除了因為此課題在漢語神學的討論不多，還因為佛教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尤其是中國大乘佛學除了導引出宋明理學的新儒家外，還對歷代中國民間信仰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sup>6</sup> 換句話說，儘管佛教是外來的宗教，起源於古印度，但無論在中國的大傳統還是小傳統上，都成功地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例如在筆者的佈道經歷中所接觸的普通市民，十居其九都說自己是「佛教徒」，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今天，我們的日常用語也用了不少與佛教有關的辭彙而不自知，例如皈依、傾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十八年後又一好漢、臨急抱佛腳、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等等。

我們可以說佛教已經成功本土化了，即是說佛教已成為中國人的宗教，或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至少我們很少聽見人說佛教是「洋教」。另一方面，在可以考證的歷史資料記載中，基督宗教初次進入中國大約是公元635年（即唐貞觀九年），以敘利亞僧人阿羅本（Alopen）為首的一群涅斯多留（Nestorian）派信徒來到長安，建立景教。<sup>7</sup> 基督宗教傳來中土已超過十三個世紀，可惜今天仍有不少人把基督宗教看為是「洋教」。誠然，佛教來華的傳教時間遠遠超過基督教（已有兩千年），但這並不是充分的理由，叫基督徒因此可以在今

天忽略佛教的經驗！本文主要站在基督徒的立場，嘗試初步思考佛教在中國成功本土化的一些經驗，例如：他們遇到甚麼問題、採甚麼態度回應、基督徒曾如何評論佛教的經驗等等，藉此作為思考基督教如何在中國發展的動力（至於筆者最有興趣的「大乘神學」，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我們未必需要——亦不應該——把佛教的經驗「照單全收」，但作為成功的例子，佛教的經驗是可供基督徒參考和借鑒的。

## 2. 淺論佛教與中國的相遇

相傳佛教在中國東漢年間（公元1世紀）傳入中國，最著名的一個「官方」傳說是：漢明帝在夢中見到一個金人，醒來時派使者赴月氏國迎請佛教聖典，帶回中國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其實，佛教何時傳入中國已不可知；一些非官方的資料顯示，佛教在很早的時候已存在於散居中國的外來家庭和群體；即是說在中國文獻初次提到佛教之前，佛教早已在中國出現。<sup>8</sup>

佛教在中國興起主要是在魏晉南北朝，因戰亂的緣故，儒家的名教和典制設施遭到嚴重的破壞，而寺院又為當時的失意者提供保身善性的居所。社會苦難日益嚴重，令玄學興起，為思辨性極強的佛教提供思想的準備。另外，北朝為「外族」統治，因而更願意接受外來文化。但佛教來到中國，與基督宗教同樣要面對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施壓」。佛教採用自我調適的方法，雖然仍盡量保持自身的宗教身份和特色，但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改革和變化。

政教關係便是一例。中國自秦始皇開始行中央集權制，皇帝被奉為「天子」，是奉上天之命來管治百姓的。康熙帝更言：「天下之權，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西方社會學家韋伯說：假如以西方的觀念來形容中國的皇帝，則中國皇帝既是世俗的權威，亦是聖職的

權威；皇帝身兼兩職，既是國君，又是教皇。<sup>9</sup>因此，雖然古代漢語並沒有「宗教」一詞，但其實宗教已滲透日常生活之中，但更重要的，是一切的宗教事務均受制於儒家的統一意識形態，以及中央集權的各級官僚機構。<sup>10</sup>

古印度的情況則大別於中國。在種姓制度下，作為僧侶的婆羅門，其地位更勝於王侯武士（刹帝利），再加上佛教有獨立的教團組織和制度，這明顯挑戰中國皇帝的管治權威。著名僧人慧遠作《沙門不敬王者論》，就是要疏解佛教僧人與中國皇帝之間的從屬關係。慧遠雖然努力爭取佛教的特權，主張僧侶無須向皇家跪拜，只須合掌致敬便可，但他同時強調作為在家學佛的居士與僧侶不同，應該跟老百姓一樣，遵守中國的忠孝大法。如此，便開始了中國佛教接受中國君主主權和儒家綱常的概念。<sup>11</sup>中國佛教並不像印度佛教般與皇權分開，甚至凌駕皇權，而是採取與皇權妥協；因為若非如此，則佛教難以在中國生存，正如慧遠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sup>12</sup>

另外，從文化上看，中國佛教亦經歷了中國化的過程。中國社會崇尚「家庭孝敬」的文化精神，甚至可以說家庭的原則就是中國的原則。譬如說，中國人「國」的倫理，是由「家」的倫理延伸出來的，故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孝」成了家庭——甚至是整個社會——最看重的倫常關係，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曾子甚至乎把孝提昇為眾道德的根源。佛教傳入中國後，其種種的表現被批評為不孝的根源。例如輪迴的觀念被說成把祖先變為牲畜；兒子割髮剃捨棄父母出家而不婚，導致無後；吃素破壞祖傳下來的飲食習慣；沒有祭祀祖先的習慣等等。<sup>13</sup>這些攻擊對佛教在中國社會生存構成嚴重的威脅，亦構成佛教可否成功本土化的問題所在。

為要讓佛教在中國生存，並解決佛教是否有違孝道這個問題，中國佛教的護教名著《牟子理惑篇》便應運而生，該書強調出家修道成正果，然後帶領家人覺悟，才是真正的孝；因此佛教的孝是一種大孝，反觀中國人的孝不過是小孝而已。此外，佛教徒不吃葷，就是怕誤吃了祖先，如此正表明佛教是重孝的。不過，為了更能調適佛教與中國人的孝道，佛教偽作《佛說盂蘭盆經》就把農曆七月十五日——即中國人的中元節——定為盂蘭盆節，引入祭祀祖先、救度亡魂的法會。另外，又偽造佛教的孝經，例如《目蓮救母》等等，以民間故事的形式，表達佛教同樣擁有像中國孝道般的教訓，此舉既平息對佛教不孝的指摘，又建立佛教重孝的教義。其後，佛教更主動在國家的祭日——即生、婚、喪、祭等日子（例如是君主的誕辰）中，在寺院舉行佛教的禮儀，把佛教的禮儀與中國文化連合，從而佛教亦慢慢滲進中國文化中。<sup>14</sup>

### 3. 基督徒論佛教成功本土化的原因

其實早在民國初年，已有中國基督徒學者開始注意佛教成功本地化的經驗，並提出基督教可以參考的地方；他們都在思考佛教的經驗後，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因篇幅所限，讓我們在此列出數位學者的主張，以供大家參考。例如趙紫宸提出佛教成功植根中國的六點原因：一、佛教初入中國的引線是與道教離世的精神相似，切中魏晉時期中國士大夫厭棄儒家、追求虛驚玄深的心態；二、行方便的傳教法，以玄深的義理吸引士大夫，又以淺易的因果報應說吸引民眾；三、有傑出的佛教徒起來承擔弘揚佛法之責，不怕受到逼害；四、佛教徒有好行為，為中國人所尊重；五、非常強調翻譯佛經的工作，使大量的佛經被引入中國的知識界；六、藉著藝術傳播佛法，深入中國文化。趙紫宸指出中國人需要宗教，但中國人卻沒有追求宗教的熱心，因此，基督教不應視佛教為競爭的對手，耶佛兩教共同要對付的敵人其實是宗教冷漠主義。<sup>15</sup>

徐寶謙對佛教的觀點，與趙紫宸不謀而合。徐寶謙指出基督教和佛教都不是中國本土宗教，但為何佛教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連重出世精神的佛教尚且能與中國文化打成一片，基督教豈非更容易為中國人接納麼？因此之故，徐寶謙認為要解決基督教植根於中國的問題，最主要是考慮策略而非文化的差異。徐寶謙總括了佛教成功的四種因素：一、大量從事翻譯和寫作，把佛教高度的靈性經驗記錄下來；二、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有高度的創新精神而不墨守成規；三、佛教採取一種與中國文化互補的態度，以出世的精神補儒家傾於入世的不足；四、佛教徒有犧牲精神，亦有高深的言行。<sup>16</sup>

另外，韋卓民倡議基督徒應仿效佛教徒，設立基督教的朝聖中心。他認為朝聖是一件宗教盛事，是東方人表達宗教傾向、排遣宗教情感的一種最佳和最自然的方式。中國的佛教徒和道教徒都在名山勝地修建了各自的廟宇道觀，而教徒們紛紛前來，如歸精神家園。在那裏，他們獲取宗教靈感，接受宗教教育，並獲得精神的滿足與安寧。民眾也常常不期而至，尋求消遣和娛樂，盡興而歸時，卻悠然而對宗教有一些認識。<sup>17</sup> 韋卓民曾參考中國佛教的經驗，提出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基督教朝聖中心。韋卓民建議基督教的朝聖中心應當選建在茂林蔭翳的山頂上，或是離鬧市數英里的林地之中。他更認為如此建立起來的基督教聖地，能夠逐漸把中國人的情感從當前的家庭中心吸引過來，因為基督徒可以在這裏紀念他們的先祖，一切宗教聚會當然也可以在這裏舉行。聖地將成為一處宗教娛悅的僻靜之地，或說基督教的靜修處。<sup>18</sup> 韋氏明顯在此表達非常欣賞佛教徒所設立的朝聖中心，因為這種朝聖中心不單使信徒在靈性上得到指引，更把基督教的神聖場所變為中國人的文化生活踐行之處。這種朝聖中心可謂是一種嘗試把基督教具體結合於中國文化的構想。

韓國神父金秉洙也非常重視佛教成功本土化的經驗，按他的分析，佛教以下的成功因素：佛教採取一種與中國文化互補的態度，以出世的精神補儒家傾於入世的不足；行方便的傳教法，以玄深的義理吸引士大夫，又以淺易的因果報應說吸引民眾，例如唐代流行的「俗講」（即把佛經內容通俗化的演講）和「變文」，就是以民間故事、寓言、比喻，來介紹深奧的佛理；而神通之異行更是吸引人的原因。另外，格義佛教（在原有的文化體系中，抽取相應的概念去說明佛教的教義）雖然是一種對佛教的誤解，卻使佛教容易為中國人明白，例如道安以道教的「本無」解佛教的「空」，以及把佛陀（浮屠）視為神仙等等。<sup>19</sup>

#### 4. 短論

從以上並不充分的討論中，整體上我們多少可以看見佛教採取盡量調適中國文化的方法，期盼盡量融入中國文化和社會之中，亦同時採取主動，大量翻譯及創作自己的經典。融合和變化，而非衝突和僵化，是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調適自身的大方向，並由此產生出與印度佛學不同的中國佛學。誠然，中國佛教在教義、禮儀上的變化，究竟是印度佛教的成全還是倒退，是值得探討的問題。<sup>20</sup> 但佛教成功地成為中國人的宗教之一，確是不爭的事實。假如基督宗教像佛教般完全融入中國文化後，基督福音就能通行無阻地在中國人的圈子中傳播，這種講法我們並不一定同意。即或基督宗教真的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相信基督福音的中國人仍有人在，儘管比例上可能少一點，但實際人數仍算可觀（至少筆者本人及所認識的基督徒就是在基督宗教還未本土化前接受福音的）。但說到底我們也不認為，基督宗教本土化對福音的傳播是毫無幫助的。

不過，按我們的觀察，基督宗教要成功本土化，可能比佛教困難。不難發現，佛教雖然有一定的體制／教制，但與基督宗教相比仍不算嚴謹，尤其是佛教「方

便」的思想，更把看似有矛盾的教義說成是成佛的必須階段。或者說，佛教不是那麼獨斷式（dogmatic）和那麼要求「正統」（orthodoxy）的，只要禮儀／律例正確（orthopraxy）就可以了，因此調適空間比基督宗教大。我們不是說如此基督宗教便不能有所調適，亦不是說基督宗教可以放棄福音的信仰而任意調適，而是想指出：基督宗教並非一成不變，它固然有不可改變的核心信仰部份（例如筆者所相信的三一論、基督論、救贖論），但其表達形式是否可以改變，其非核心部份有否發展的空間，佛教在中國成功本土化的經驗，亦有其參考價值。例如，翻譯基督教神學名著、基督徒有好行為、利用不同的媒體表達信仰、發揮領導文化風氣的作為等等，都是在資源許可下不妨嘗試的策略。至於教義方面，例如可否有格義基督教、以行方便之法來佈道，以及是否可以祭祖等問題，則仍有待基督徒進一步思考和討論。

<sup>1</sup> Rainer Albertz, *A History of Israelite Relig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Perio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4), 76-82; Lawrence Boadt,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69), 222; Richard S. Hess, "Yahweh and His Asherah?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s," in *One God, One Lord: Christianity in a World of Religious Pluralism*, eds. Andrew D. Clarke and Bruce W. Winter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1992), 13-42.

<sup>2</sup> Jacques Dupuis, S.J., *Toward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7), 53-83.

<sup>3</sup> Mary T. Clark, *Augustine*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1994).

<sup>4</sup> Alister McGrath,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87), 32-121.

<sup>5</sup> 參 John P. Keenan, *The Meaning of Christ: A Mahāyāna Theology* (Maryknoll, N.Y.: Orbis, 1989), 51, 245。另參賴品超：〈從大乘佛學看迦克墩基督論〉，《輔仁宗教學研究》2（2000秋）：231-262。

<sup>6</sup> 有關近代中國基督教與佛教的相遇，參賴品超編：《近代中國佛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香港：道風書社，2003）。

<sup>7</sup> Sverre Holth,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Nestorian Period," *Ching Feng* 11.3 (1968): 20-21；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二刷），頁63。

- <sup>8</sup> 許里和 (E. Zürcher) 著，李四龍、裴勇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 28-59。
- <sup>9</sup> Wolfgang Franke,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 R. A.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1967), 115.
- <sup>10</sup> 金秉洙：《衝突與融合：佛教與天主教的中國本地化》(台北：光啟，2001)，頁 57-72。
- <sup>11</sup> 參方立天：《中國佛教研究》(台北：新文豐，1992)，頁 696。
- <sup>12</sup> Kenneth K. S. 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78.
- <sup>13</sup> 秦家懿、孔漢思著，吳華主譯：《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台北：聯經，1989)，頁 199。
- <sup>14</sup> 金秉洙：《衝突與融合：佛教與天主教的中國本地化》，頁 227-230。
- <sup>15</sup> 趙紫宸：〈中國民族與基督教〉，《本色之探——20 世紀中國基督教文化學術論集》，張西平、卓新平編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頁 18-22。
- <sup>16</sup>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 再版)，頁 42-48。
- <sup>17</sup> 韋卓民：〈中國教會的四大中心〉，《韋卓民基督教文集》，馬敏編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 135-136。
- <sup>18</sup> 參韋卓民：〈中國教會的四大中心〉，頁 136-137。
- <sup>19</sup> 金秉洙：《衝突與融合：佛教與天主教的中國本地化》，頁 232-243。有關格義佛教的討論，參彭自強：《佛教與儒道到的衝突與融洽——以漢魏兩晉時期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2000)。
- <sup>20</sup> 可參松本史朗著，蕭平、楊金萍譯：《緣起與空——如來藏思想批判》(香港：經要文化，2002)；Jamie Hubbard and Paul L. Swanson, eds., *Pruning the Bodhi Tree: The Storm over Critical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作者蘇遠泰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導師，亦為宣道會黃埔堂義務傳道。

## 余國藩教授「宗教研究講座」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崇基學院神學組及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 合辦

余國藩教授 (Anthony C. Yu) 為芝加哥大學「巴克人文學傑出講座教授」(Carl Darling Buck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除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任宗教與文學講座教授外，亦任教於比較文學系、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英國語言及文學系及社會思想委員會。余教授亦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余國藩西遊記論集》(1989)、*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1997)；譯作有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西遊記》) 四冊 (1977-83)，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 第一講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Rhetorical Considerations

從歷史與修辭上的考察看  
中國的國家與宗教

日期：2003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二)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15 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壁樓四號演講廳 (LT4)

語言：英語

### 第二講

文學與神學的另類研究模式

Alternative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日期：2003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15 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樓二樓研討室

語言：粵語

查詢請電 2770 3310 與梁小姐聯絡。